



冯友兰作品精选

冯友兰作品精选

中国现代 哲学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哲学史 / 冯友兰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9.5

(冯友兰作品精选)

ISBN 978-7-108-03075-7

I. 中… II. 冯… III. 哲学史—中国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5915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80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8.00元 (内部发行)

冯友兰作品精选

出版前言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现在刊行的第二辑则包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等，一共四种五册。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内涵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2种语言的译本出版。1949年后，冯友兰

辞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曲折，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0世纪40年代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而冯友兰在撰写六书时，怀抱了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他把当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所谓“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

1949年以后，冯友兰的“贞下起元”这一信念发展为“旧邦新命”的提法。“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强烈的现实意味；“旧邦新命”则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通观古今的历史感。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他在自序里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冯友兰一生的著述事业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可最终概括为“旧邦新命”一语。1987

年，92岁的冯友兰在一篇文章中再次申说此意：“《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

* * *

“冯友兰作品精选”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底本，其中有些标点、句式的用法与现在的规范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著面貌，均未作改动（《中国哲学简史》则采用新近的赵复三译本）。另外，各书中使用了许多“底”字，作为助词的“底”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的”字没有区别，但在当时的语言习惯中，表示定语与中心词之间是领属关系时，“底”一般不通用为“的”，请读者根据文意加以区别。

各书中的一些译名也与现在一般通用的有所不同，如“海格尔”今译为“黑格尔”，“圣多玛”今译为“圣托马斯”等，斯宾诺莎的《致知篇》今译为《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心的形态学》今译为《精神现象学》等，本次出版也未作改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9月

自序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于1964年6月印行。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遂又从头撰写。将已出的两册作为“试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编》七册终于完成了。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即本书最后一章。——编者注）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

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在写第七册（即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编者

注)的过程中,张跃同志为搜集材料,提出意见;陈来同志也提出很多重要意见;朱伯崑同志也帮助看稿子。趁第七册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90年7月11日

目 次

自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1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3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6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10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 章炳麟	11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12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13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17
第四节 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20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 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21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22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 半封建思想	24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级 思想——建国方略	27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 思想	31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

蔡元培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

梁漱溟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
儒家的新解释
-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

李大钊

-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
奋斗目标
-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六章 20—40 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 第一节 20 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
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	
	的总结	115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	
	论战	118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122
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127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128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	
	斗争	132
第三节	《实践论》	135
第四节	《矛盾论》	140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	144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148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153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156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160
第一节	道、式、能	161
第二节	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168
第三节	性与尽性	171
第四节	理与命	173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175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180
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	
	——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184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185
第二节	理，太极	186

第三节	气	190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197
第五节	精神境界	197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199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	
——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201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201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205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209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213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217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使社会生产力一下子提高了几百倍，以至几千倍，这就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产业革命打破了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这就是那个大变化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男耕女织，男的用一些简单的农具耕种一百亩左右的土地，每年收入的粮食就足够他一家几口人吃了；女的靠一张织布机，每年织几匹布就够她一家人穿了。他们的生产都是为自家的消费，这就是自然经济。

产业革命以后，这样的自然经济就不能存在了。一个纺织工厂用机器生产，机器一开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产很多匹布。它生产的布就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卖钱。这种经济就是商品经济。

有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人们就不能不用它，因为它的生产比手工业生产快得多，它的产品比手工业产品好得多。但是，一用它，生产力的结构就要大变。一架大机器制造起来要用很大的本钱，使用起来要用很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所用的简单的生产工具不能用了，他们要依靠机器生产，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一架机器需要很多工人才能开动，拥有机器的人则不开动机器，于是社会中就产生两个新的阶级：一个是资本家，即资产阶级；一个是工人，即无产阶级。它们就成了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它们真正是一个矛盾中的统一体。

一个封建社会如果听其自然，它就会照着这个程序向前发展。这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绪论中已经讲过。

中国的封建社会受了外来的压迫，不能自然发展，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式下也还是出现了新的阶级。

在资产阶级方面，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的商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资本家，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官僚资本家是从中国封建官僚转化过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靠外国的势力发家致富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依靠他们手中的政权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夹攻中艰难

地挣扎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虽有三个，但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因此无论哪一个资产阶级都要有无产阶级作为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互依存的。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在现代革命时期，有两个革命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两个阶级先后领导了两次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阶级各自在旧社会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结为联盟，共同进行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找到的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无产阶级找到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工农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联盟，则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注意。好像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要多说一点，以明历史的真相。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发动宫廷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之后，迫于中外舆论，也说是实行立宪。她声称实行立宪要有充分准备。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她订了一个时间表，提出以九年为准备时期，每年把皇权下放一点于民。她所谓“民”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当时称为“绅”。

照清朝的制度，受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称为“官”。在各省做官的人都要回避本省，就是说，不能

在他的本省内做官。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或已经在别省做过官的人就称为“绅”，他们就算作本地区的“民”。清朝末年所谓“民意”、“民办”，其实就是“绅意”、“绅办”。慈禧太后在她的准备立宪的时间表中，声称要把皇帝的权力分期下放于民，这个民其实就是“绅”。

慈禧太后和以后的清廷，为了装饰门面，也设立了所谓“民意机关”，在中央设了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象征。这些民意机关的议员，也还是由上面指派的，可是他们不是官而是绅，更好听一点说就是“民”。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这些民意机关在实际上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各省的革命军起义以后，往往推举咨议局的议长主持民政，也有些省是由咨议局出头发动革命。再看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的行动，事情就更清楚了。

袁世凯本来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出卖了谭嗣同，帮助了慈禧，以致变法失败。慈禧死了以后，光绪的兄弟当了摄政王，迫使袁世凯退居原籍河南。于是，他就不是官而是绅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用北洋新军打革命军，因为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又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作为统帅，于是他又由绅而成为官了。

袁世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各省的绅和革命军的声势，以及他自己手中的兵权，取清朝皇帝的地位而代之。他所统率的政府军打了一次比较硬的胜仗，攻占了汉阳，他的前线指挥官就联名发出通电，请清朝皇帝退位，

交出政权。清朝的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政府，与革命军议和。当时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以及当时的人事安排，就是南北统一的条件，也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盟的条件。

南北统一以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待以元首之礼。在一次正式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说，他要办一个中国铁路公司，修铁路二十万里；要袁世凯训练一百万军队，认为这样中国就富强了。孙中山的这个演说的含义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要分工合作，资产阶级负责经济方面的建设，地主阶级负责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设，这也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条件。

袁世凯当然接受这个条件，下命令成立中国铁路公司，任命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可是修铁路的资金一点也不给，孙中山只好在上海的一个小马路上挂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的空头招牌。

孙中山不久就知道受骗了。他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失败了。袁世凯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自己当皇帝，这就是地主阶级完全复辟。革命的进程最终是只能前进的。袁世凯的复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帝制失败了，他自己也死了。此后就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面目全非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政权的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传说中的尧、舜为典型的，称为“揖